「支那」和「秦」：一筆糊塗帳

施康強

回到我們的神父。爲了防止知縣認爲China和Chinese這兩個詞暗含諷刺或惡意，神父作了解釋。原文很長，實際上相當於一篇考據論文，而且涉及多種語言的細節。作爲誠實的回憶錄作者，神父聲明，當時他對知縣沒有說那麼多。筆者在此更不便照錄，述其大概而已。

古伯察神父說，這兩個詞毫無疑問，確實是中國的本土貨。中國人向來以執政王朝來稱呼他們的國家。所以在遠古時候，他們稱自己爲唐、虞、夏。在漢代稱漢人，唐代稱唐人，到了清代則稱清人。

「我們把這個偉大的國家稱為China，其實這個稱呼在東亞已被廣泛使用。我們從馬來人那兒把這個稱呼借了過來，他們管中國叫Tchina。馬來人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就與中國人相交往，那時著名的秦始皇統治着中國南方和東京，甚至遠征到交趾支那。秦朝的時候，馬來群島上的人們由於與上述國家有直接往來，就與自稱秦人的中國人打上了交道。馬來人並不知道，秦字的各個字母是什麼，就把它讀作了Tchina，在後面加了一個a的音。後來那些把葡萄牙商船帶入中國港口的舵手和海員，也都是馬來人的後裔，所以自然地，葡萄牙人便採用了他們的嚮導們對中國人的稱謂。最初的歐洲人因此把中國叫做Tchina。後來根據各個國家不同的語言習慣，這個名稱稍有改變。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與印度最初的交往始於秦朝。和馬來人一樣，印度人把這個稱謂改成了Tchina，他們還用ths代替了tch。阿拉伯人從印度人那兒借來這個詞，把它寫成Sin-Sina，以符合他們的語言習慣。以前用來稱呼中國人的拉丁詞Sinae-Sinensis很有可能就是從中衍生出來的。」【按：法國殖民時期稱越南的大部分地區爲「東京」，最南部以西貢爲中心的地區爲「交趾支那」。】

可敬的古伯察神父首先肯定「中國與印度最初的交往始於秦朝」，這裡他有點混淆秦國和從秦始皇開始的秦朝，在此不予細辨。不過我樂意相信神父作爲西方人對China一詞的起源的說法。他梳理出一條較晚的傳播路線：馬來人—葡萄牙商人—歐洲人。這以前，根據古神父的說法，歐洲用於稱呼中國的拉丁詞Sinae-Sinensis同樣源自「秦」字。再早，在中國漢代，中國商販通過絲綢之路與波斯和羅馬帝國的商人互換貨物。希臘人稱絲蠶爲ser，稱出產絲綢的國家爲Serica。China並非得名於瓷器，Serica倒是源自絲綢。

然後，談到「中國」一詞應如何理解，古伯察神父所持見解頗爲通達，不過在考證上有點纏夾。他說：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稱呼頗多，最古老、最常用的就是「中國」，即中心帝國。「中國歷史學家將這個名稱追溯到成王，周朝的第二個皇帝。這個時候當時中國實行封建制，整個國家分成了若干個諸侯國。成王的叔叔周公把他的分封地洛陽叫做『中國』，因為它座落在其他諸侯國的中間。從此，皇帝統治下的帝國的土地，或部分或整體，都稱『中國』。關於這個稱謂的起源，只有這個說法正確。但在有關中國的大多數歐洲出版物裡，人們嘲笑這個稱謂，並以此推斷中國人完全不懂地理。然而更確當地說，是我們不懂他們的傳統。」

文化經緯

想必神父沒有對宜都知縣說這段話，否則他留給知縣的博學印象將大打折扣。他沒有弄清楚，周公的封邑在周（今陝西岐山），而不是洛陽。周公平定管叔、蔡叔和霍叔的叛亂後，營造洛邑（今洛陽）爲東都，大規模分封諸侯。若是他因爲自己的封邑在洛陽，就把洛陽叫做中國，倒是眞的犯了僭越之罪，三叔討伐他也就名正言順。事實是，還是引用老《辭海》：「我國昔時建都黃河南北，別於四方之蠻夷戎狄，自稱為中國，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其次，中國君主稱皇帝始於秦始皇。周朝稱王或天子，不稱皇帝。神父有謬誤或下筆不嚴謹，譯者理應在這些地方作一說明，以免誤導。

其實，每個強大的民族都樂意把自己居住之地視作中心坐標。如果「支那」在梵文裡本是「邊鄙」的意思，那麼顯然古印度人把自己的國家看作見聞所及的地域的中心，我們中國人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他們的「北夷」。

行文至此，正好回過頭來說說「支那」在日語裡是否蔑稱。根據日語學者的說法，日本歷來用中國當時的國號稱呼中國。滿清入主中國後，他們稱中國爲清國。十八世紀初，日本學者接受「蘭學」，將九世紀初通過佛教傳入的「支那」一詞與西方的China相對應。明治維新後，日本「脫亞入歐」，開始用「支那」替換原有的各種稱呼。甲午戰爭後，日本強大，視中國爲可欺，開始蔑視「支那」。另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爲如果承認中國是「中央」之國，日本自己就成了「東夷」。（有關這個問題，日本自己的學者也表達過客觀的看法。據胡阿祥書第七章第二節註三十三，堀敏一著《中國和古代東亞世界》指出：中國一詞，指說全土的中央部分是原義，將其解作天地的中央，與天下觀有關，是後來出現的思想。中國兩字，本來也無輕蔑「別人」的意思，只不過是用以表達當時人們的地理感覺罷了。）由於中國輿論覺察到日語「支那」隱含不友善的意義，表示強烈不滿，後來日本雖在正式外交場合棄用，但在其他場合仍廣泛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支那」一詞才從日語正式場合全面退出。

《中華帝國紀行》，[法]古伯察著，張子清等譯，南京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九月

《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胡阿祥著，湖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下）

新年是一場重溫的舊夢

張大偉

還來不及回頭看看走過的日子，匆忙間又要辭舊迎新。想到一句直白卻如眞諦的常話：「日月如梭，時不我待」。日子於人，就像赴宴一樣，滿桌的美味剛剛上齊，還來不及細細品嘗，來不及推杯換盞，就匆匆撤下重新開張。想想，很茫然，又覺得可笑。

拉開抽屜，又翻出些許往年的賀卡，每一張都是新年前夕如期而至，都透着嶄新的氣息。祝福原本就是虛無的話，但用心說出來，就能口吐蓮花，在別人的心頭迎風開放。祝福裡含着期盼，含着祈禱，是成本最低的口頭贈予。雖然虛無，卻不是唯心，其實都是美麗如花的預言，只要向着遠景堅實的邁步，這些如花的預言就能開花結果。

誰家綠楊堪繫馬？任憑綠樹成蔭，楊柳成行，也拴不住時間和歲月的腳步。想到那些到寒山寺聆聽新年鐘聲的人，夜半鐘聲，歡呼雀躍，會不會心緒萬千，浮想聯翩，感懷歲月蹉跎，一無建樹，又欣然可以拂去舊塵從頭再來。就像現在，要忙着總結工作，要着手制定計劃，要調節好心態，盡力地爲自己，爲別人準備一個盛大精美的節日儀式，準備付諸新年的跨越。

想想，新年是極其公平的方式，貧困的人和富有的人，平常的日子過得有如天壤之別，新年卻一起過節。春風得意和困頓落魄的人，一樣過年。健康和病弱的人，迎新都在同時同刻……在時間交替和季節變更上，新年仁慈的給每個人平等的待遇，一樣的預示辭舊迎新，一樣的預示春暖花開，一樣的預示如意吉祥。剩下的日子，騎馬或者步行，就靠你自己去丈量。

看看窗外，大街上粗壯的法桐樹黃葉飄飄。我知道這些樹，哪怕葉子落盡，明年依舊會綻露新芽。一棵樹是能夠感知新年的，葉子落盡，貌似枯萎，卻在暗暗聚集着新生的力量。誰知道一棵樹在寒風裡等待新年的痛苦？誰又知道在春風裡渴望新生的喜悅？

流年似水，留不住歲月。新年還是新年，每一個日子卻今非昨昔。新年悄然開啓了新的年輪，秘密就藏在每一個生命深處。

終於覺察到，新能變舊，舊亦是新。新年其實就是一場重溫的舊夢。每一次時間的暗示，每一場倉促的盛宴，每一片祝福的潮水，每一回身心的涅槃，都是往日的重演。

領悟到這些，覺得異常的坦然，覺得走過來的日子非常的充實，與其在名利和心機裡身心疲憊備受煎熬，倒不如用清新之水給心靈沐浴，滌盡舊日的灰塵，換以清美之心、平和的笑容走在路上，出入家門。

重新把零散的東西歸於齊整，再分門別類裝進箱子，像把屬於過去的所有的日子和記憶打包。人生只有現在，只有將來，過去的不能回轉，也不可眷顧。昨天是今天的鋪墊，今天又是明天的預演，辭舊迎新的眞諦，在於每一刻都是新年，每一回都是新生。

而比感懷和眷顧更爲重要的，是在乎和珍惜能握住的此時此刻。

周恩來調研二三事

劉開生

人與事

一

上世紀一九五四年冬季的一天傍晚，周恩來對秘書說：「群衆反映北京市公共汽車擁擠得很厲害，職工上下班要在路上耽誤很長時間，今天咱們去乘公共汽車，了解一下情況。」說着，周恩來披上大衣，帶着秘書和警衛疾步走出國務院北門，來到北京圖書館停車站。等了一會兒，公共汽車來了，周恩來等群衆上完車，自己也上了車。

車廂的確很擁擠。周恩來往裡走了幾步，手抓住吊環，站在車中間。汽車開動了，站在周恩來對面的一個乘客突然發現了他，大聲說：「哎呀！這不是周總理嗎？」周恩來揮動着手臂，對大家說：「大家請坐！請坐！別擠！別擠！不要動。」乘客們請周總理坐下，他就是不坐。此時，一個乘客湊上來，握住他的手說：「總理，您那麼忙，怎麼還來坐公共汽車呢？」周恩來笑着回答：「我來體驗一下大家的生活。」接着，周恩來便和乘客們攀談起來，詳細了解乘車情況。隨行者勸他說：「公共汽車上的情況就是這樣了，咱們趕緊回去吧。」周恩來不肯，下了那輛公共汽車，又上了一輛無軌電車，轉了大半個北京城。

回來後不久，周恩來即將有關部門的領導找來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和制定解決公共汽車擁擠的具體措施。他還指示國務院各部門和有關單位，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都要用大車接送職工上下班。經過周恩來的努力，北京市乘公共汽車擁擠的情況逐漸得到了緩解。

二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經歷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時期。同年五月初，周恩來來到河北省邯鄲專區武安縣伯延公社搞調研。武安比他想像的還要貧困。他見路邊的樹光有樹枝沒有樹葉，便問隨行人員：「這樹葉兒都哪去了？」陪同的幹部怕說出實情總理心裡難過，就信口說：「被羊吃了。」哪知此話正好被路旁放羊的一個女孩聽到。女孩馬上反譏：「羊能上樹嗎？」總理聽後無語，可心裡一切都明白了。

在先鋒街大隊第六公共食堂調研時，周恩來組織召開了由先鋒、勝利兩個大隊幹部及部分小隊幹部和社員代表參加的座談會。開始，也有一些人說食堂好，可大多數人都沒有表態。看到這種情況，總理說：「大家不要有顧慮，有話儘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過了一會兒，還是無人發言，總理親切地問坐在一邊的農民張二廷：「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不說話呀？」張二廷猛地站起來說：「總理，你叫說眞話，還是說假話？」「當然是要說眞話嘍。」「要說眞話，那剛才有些人說食堂好的話都是假話。食堂好，就是吃不飽！」總理問：「爲什麼吃不飽？」張二廷說：「總理你算算，一個人才多少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吃點，他們的孩子老婆爹娘多吃點，幹部再多吃點，還能剩幾兩？最多剩三四兩，這會能吃飽？吃不飽，人浮腫，幹活沒勁兒，就連牲畜瘦得都能被風颳倒。這禍根一是幹部作風浮誇，二是吃公共食堂！這種情況如再不糾正，過兩年連你也吃不上飯了。」總理耐心聽完二廷的話，然後又問：「爲什麼說再過二年，連我也沒飯吃呢？」二廷說：「我們吃不飽，幹活沒有勁，地裡就不打糧食。長的那點青稞還不夠俺生啃着吃呢，哪有糧食交國家？一年不交，國庫有。二年不交，國庫有。三年不交，國庫也就沒有了。國庫沒有了糧食，你還能不挨餓？」總理聽了很受感動，動情地說：「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講眞話的人。好！咱倆交個朋友吧……」

回到北京，周恩來把調研得到的眞實情況及時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加上其他中央領導與周恩來大致相同的調研結果，中央很快作出決定，解散了農村公共食堂。

三

一九六二年六月的一天，周恩來視察吉林化學工業公司。這次視察同樣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爲解決人民群衆吃飯、穿衣問題而進行的調查研究。

在吉化公司，周恩來聽說化肥廠準備擴建一個四萬噸尿素車間時，關切地問：「需要多少投資？」公司領導回答：「大約八百萬元，另外還需把現有合成氨生產量從（年產）十五萬噸擴大到十八萬噸。」周恩來又問：「這又需要多少錢？」「大約三千萬元。比建一個新廠便宜得多。」公司領導回答。周恩來當即對秘書顧明說：「合成氨增加到十八萬噸，尿素四萬噸，只要三千八百萬元投資，這很好，記下來，回去幫他們解決一下。」接着，周恩來還詢問了化肥廠花了多少投資，搞個新廠需要多少錢等。最後他表態說：「還是擴建划算，省錢。」在電石廠，周恩來詢問了用電石生產維尼龍的情況。當聽到公司領導說爲了能夠盡快生產維尼龍，最好從日本購買一套（年產）一萬噸維尼龍生產線，因爲日本的原材料消耗低，日本廠商報價二千九百萬美元時，周恩來說：「二千九百萬美元就能引進一條維尼龍生產線，可以考慮解決。」接着，周恩來又問：「一萬噸維尼龍可以做多少衣服？」公司領導回答：「大約二千萬套，六千萬米。」周恩來說：「六千萬米相當於一點八億尺，那不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維尼龍應該搞。」

周總理回京不久，吉林化學工業公司期待解決的生產難題便解決了。

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

在任共和國總理的二十七年裡，周恩來的足跡踏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水，他到工廠，下連隊，進機關，走農村，上學校，走進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士兵、幹部中間，噓寒問暖，關懷備至，贏得了人民群衆的尊敬與愛戴。周恩來搞調研絕不是爲調研而調研，更不是作秀，而是實實在在地幫助基層解決實際困難或把通過調研得到的客觀事實和在調研中形成的正確思想，作爲宏觀管理決策的科學依據，這兩點是他搞調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尤爲重要。

飲馬納帕海（攝影）陳柏榮

己之所欲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己之所欲，必施予人」是儒家一條道德信條。將它貫徹到人際關係中去，一般會贏得「善解人意」、「通情達理」的美譽，但使用範圍一旦溢出特定圈子，會招來誤會或糾紛。

有例子爲證。一位退休了半年的洋朋友，他原先和我是同事，二十年來私交不錯。因這兩層關係，他賦閑後我和他、還有幾位合得來的同事，不時在餐館或唐人街的茶樓聚會。那天我忽然想及，兩個月前見面後，和他沒了聯繫。不知他從香港旅遊回來沒有？便撥了他的手機，他沒有接聽。次日早晨，他回了電話，聽濃重的鼻音，可推知在賴床。一直生龍活虎、愛說笑話的傢伙，這回帶着罕見的哭腔。「病了，兩個多月，給折磨得不輕。」我忙問是什麼病，他說病情複雜，難以說清，反正不是感冒、花粉症、偏頭痛一類小毛病。隔天得去看醫生，天天服藥。我好言安慰，說會告訴別的朋友，哪天約齊了去探望他。他很是感謝，怕他精神不繼，我沒多說。然後，我把這事告訴了幾位朋友。

我的宗旨是，他早已離婚，老年而單身，加上病，寂寞得要命，打電話給他，表示慰問，是理所當然的。換上我，纏綿病榻之際，最興奮、最欣慰的莫過於在靜悄悄的病室裡，忽然響起朋友們的笑聲了。朋友們離開後，床頭几擺着他們送來的鮮花，也長久地溫暖着心坎。

不料，一天後，抱病的洋朋友給我的手機留下口信，先說了「感謝關注」一類套話，然後轉了話鋒，請我務必爲他的病情保密，眼下他既不想受打擾，也沒興趣去攀交情。待痊愈後，他自會出門，和大家聚會。不難推測，好幾位朋友在我報信後，給他打了電話，盛情可感，也使人不勝其煩。由此可見，至少有兩類人，要麼性格特別堅強要麼心性格外好強，其非強項部分，是不願意顯露的，也不接受人家對他們虛弱一面的關注。此所以女明星把「素面示人」視爲奇恥大辱。

己之所欲，是不是普世之所好，不要「想當然耳」，須先問問對方，才決定施還是不施。

樂見「網友報道」成爲二〇〇八新趨勢

盛翔

文化什錦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報載了這樣一則新聞：某網友博客上一則幾十字的博文意外引發波瀾：曾經轟動全國的湖南漣源「滴血收容站」事件主角蕭笑華，早已「悄然」成爲這個以煤炭爲主導產業的縣級市的煤炭工業局副局長。關於這件事情本身，我已經深感「審醜疲勞」，且留待評論同行去抨擊和質問。引起我注意的是這一新聞的初始來源，即：某網友博客。盤點二〇〇八年的各類熱門新聞事件，我發現了一個頗爲值得玩味的現象：很多熱門新聞的出爐，已經一改了往日由傳統媒體最先披露進而公衆關注評論的傳播路徑，而是直接由網友最先揭露，然後傳統媒體跟進報道，最後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顯然，「網友報道」已然成爲二〇〇八年一種新的流行趨勢。就拿最近內地引起轟動幾個新聞事件來說，「出國考察門」是最先由網友發帖曝光的，「地方政府副職官多爲患」是由網民查閱地方政府網站揭露的，「溫州施粥棚」也是由網友最先介紹的，「局長抽天價煙戴名表」同樣是從網友披露開始的，還有多起「問題官員復出事件」，無一不是最先由網友最先發現……驀然發覺：在如今的網絡時代，「網友報道」已經讓「人人都是記者」成爲可能。開放的網絡，讓原本屬於網友個人的偶然發現或者親身經歷，能夠瞬間大面積傳播，進而有機會上升爲社會公共事件。無論是好人好事還是壞人壞事，都在這個平台上獲得了很多被報道和被傳播的可能。對好人好事而言，這是一種更有效更便捷更及時的推介和表揚；對壞人壞事而言，這是一種更周密更細微更獨到的揭露和抨擊。當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沒準就有一雙眼睛或者一個鏡頭在對準你，不經意間也許你的所作所爲就將廣爲人知。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它更加精妙地詮釋了「是金子總會發光」以及「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在公衆監督方面，「網友報道」已經初顯巨大威力。所謂正規的監督體制也許對某種隱性腐敗或者違法亂紀行爲無能爲力，但是，「網友報道」讓一切成爲可能——即使是工作照片上的一盒煙，也可以經過「網友報道」上升爲一個腐敗醜聞，這該是一種多麼有效而全面的監督啊！「網友報道」一方面得益於政府信息的逐步公開以及網絡環境的相對開放，另一方面又將進一步推動信息公開的步伐和監督體制的完善。同時，它還極大地增強人們的公民意識和主人翁意識，給人們以強勁的納稅人感覺。我很高興在對二〇〇八年進行個人盤點的時候，能夠發現「網友報道」這一新的流行趨勢，它不僅是一種全新的頗具震懾能力的監督力量，它更是公民眞實享受「四權」的一個開始：我知情，我參與，我表達，我監督——這就是「網友報道」。

北京書市憶往

許揚

往事鈎沉

前不久，北京的秋季書市宣告結束。書市舉辦期間人們不僅可以買到自己喜愛的圖書，而且還有一些作者在現場簽名售書，滿足了許多「粉絲」的願望。

買書、讀書、藏書，一直以來都是北京人的一大樂趣，老北京的大宅門與四合院最常見的門聯就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反映出百姓世世代代對文化知識的企望。過去不少富貴人家、書香門第還紛紛築室藏書，認爲藏書既可以美其名，還可以像田、宅、財產一樣傳給子孫。時至今日，北京人依然延續了這種讀書求知的好習慣。

北京的書市已有幾百年的歷史，書肆最早始於遼代，到了明清民國時期，老北京經營古舊書的書肆、書舖更加興盛。那時的書肆集中於前門內的棋盤街、廣內的報國寺、慈仁寺和琉璃廠。這些書肆爲吸引購書者，都將一些古舊書籍及期刊雜誌在門前擺放，供來京參加科舉考試的文人墨客、莘莘學子們瀏覽、挑選。一些小書商販則尋廟會期間設攤於隆福寺、護國寺、白塔寺、城隍廟等形成書市，這或許就是內地最早出現的書市。由於當時的書肆、書攤衆多，像琉璃廠、隆福寺等地，逐漸已形成古舊圖書的文化街，成爲文人經常光顧搜尋古舊書刊和補充短缺書籍之場所。

清乾隆年間，以大學士紀曉嵐爲首編纂四庫全書的人員，出於考證典故的需要，也常到琉璃廠搜集古籍。據說那時紀曉嵐買書「日費數十金」。有些學者在府宅不易見到，倒是常常出沒於書肆。後來的李大釗、魯迅、老舍、齊白石、劉半農等名人雅士，也是古舊書肆的常客。據《魯迅日記》記述，魯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中，他到琉璃廠去過四百八十多次，總計購買三千多冊所需書籍。

那時爲數衆多的學生每到課餘和假日，都喜歡留連古舊書店，一呆就是幾個小時，有的是爲買書，有的則只是立足翻閱、摘章尋句。那時期沒有群衆可去的圖書館，書店成爲閱覽讀書之地。

老北京崇外東打磨廠裡的「老二酉堂」、「寶文堂」等書局，是有名的刊印經銷古版書籍和印製普通百姓喜愛的《三字經》、《百家姓》及戲曲、鼓曲小曲唱本的場所，其出版的唱本馳名京城，深受平民百姓的青睞。

東打磨廠那時也是北京的一條文化街，這裡的衆多書局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併入琉璃廠的古舊書行業。另外當年老北京的東安市場、西單商場也設有不少書店和書攤，逐漸與琉璃廠、隆福寺的書店成爲老北京的四大淘書之地。

一九四九年後，第一家新華書店在北京王府井開業，開始時出售原東北書店和蘇聯出版的圖書，那時最受歡迎的是《聯共黨史》以及趙樹理等人的小說。

「文革」前一些書店出版社曾經深入機關、工廠、學校、農村，舉辦過小型書市，送圖書到基層，便於群衆購買。上世紀八十年代，每年的春秋時節都在地壇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首都體育館等多次舉辦精品圖書和特價圖書書市，有幾百家書店、出版社參加，逛書市也成爲北京人淘書、買書、讀書不可或缺的一樁樂事。